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中國  
現代  
文學  
專題論集

程仁章 著

中国现代文学专题论集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当代部分)几个专题研究的论文集。它包括鲁迅研究、有争议的作家作品研究、散文名篇赏析、小说艺术分析,以及新时期以来改革题材小说的研究、文学名著改编成影视艺术的研究等。其中有把现当代文学打通加以一体性研究的内容,如从当前崛起的“新写实主义”追溯到萧红的《呼兰河传》,以说明《呼兰河传》开辟的独特的小说创作艺术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开拓,当前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亦有它特殊的艺术价值。

## 后现代文学研究

---

作者:程仁章

出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社址:香港南丫岛宾华园 85 号 A 座二层

通讯:香港南丫邮政局 21 信箱

发行:香港青文书屋

印刷:新世纪印务公司

版次: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初版

定价:6.10 元(人民币)

书号:ISBN:962-497-019-X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序

程仁章同志结集的论文集，包括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读完以后，我感到，这本论文集，不但有出版价值，而且将会留传下去。

作者是勤于思考和勇于探索的，因此，发出的声音也就不同凡响。文学研究，归根到底，我认为是人的发现、情的发现、美的发现，它与文学创作的目标是一致的。所谓人的发现，就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所谓情的发现，就是不但发现理念，还要把文学所特有的注入的感情的因素发掘出来；所谓美的发现，就是不但能发现常态的美，还要能发现变异的美，诸如鲁迅早年所歌颂的恶魔之美。文学研究所提供的积极成果，正如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必须有思想的增殖，思想群的产生。什么叫思想，我认为思想就是关系的发现。

举凡这些，我认为在程仁章同志论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他谈问题，力图从客体对象（作品—社会）的关系中加以审视，因而便谈得深沉而宏博，能够抓住对象的本质，而本质正是对象的全面的关系的展现。

他在《也论鲁迅思想发展道路》一文中，着重从内因方面找根据，认为鲁迅的真诚的道德观和现实主义精神是促成他思想和世界观转变的更重要的契机。他的《阿Q——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一文，在谈到阿Q的悲剧性格时，深刻地指出：“穷人在物质生活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受辱是悲剧。阿Q为了逃避其失败再失败，屈辱再屈辱的痛苦，便把希望寄托在冥冥的

幻想中，不能也不愿正视残酷的现实。这是阿Q的真正的悲剧。”作者批评了“鲁迅只看到民族的缺点是悲观的”的论调，他引用了鲁迅在1936年《致尤炳圻》信里的一句话：“日本的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患，是未受蒙古的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认为这是真正对自己的民族负责。

作者在《从〈伤逝〉的评论看当前鲁迅研究的问题》一文中，认为鲁迅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以意为主的、不顾实际情况的僵化的评论模式。其中有（一）随意拔高，贴政治标签；（二）假象征含义，作无聊推测；（三）生吞活剥，搞新形式主义。因而，从神化鲁迅这一极端向贬损鲁迅这一极端滑行，似乎有其内在联系，都是离开了作为研究对象鲁迅的真实，特别是淡化了对鲁迅作品艺术魅力的分析，亦即把鲁迅政治化了。作者在《试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一文以及对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的分析中，对徐志摩的诗美和沈从文的艺术世界作了中肯而富有诗意的描述，而这种描述正体现了作者对美的发现的收获。确实，能从这些有争议的作家作品中发掘其中的美，就是评论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多次反对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僵化的思维模式，从而使我们在他的论文中呼吸到一种不拘一格推荐人才的新鲜气息。他高度评价了张恨水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并认为张恨水先生是非鸳鸯蝴蝶派作家，他说：“对于一个作家和他的某些作品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应该说是正常的，但是一种僵化的思维定势和批评模式又确实使某些批评失之公允和科学，它偏离着作家的实际，难于真正做到对作品的艺术真谛的感

知和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肯定了张恨水言情小说的艺术意蕴。因为情的发现美的发现，正是一切文艺创作的生命所系，同时也是所谓一切真正评论都是再创作的证据。作者的批评充满着现实主义的精神。

此外，在他的对现代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名篇的赏析性文字中，既披露了原作的真情，又揭示了蕴含其中的深意。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组优美的散文，一组情的发现的好文章。

以现当代打通来观照文学，正越来越成为明智之士的一种共识。作者从新写实主义的崛起，从诸如刘恒的《伏羲伏羲》（后改编为电影《菊豆》，引起轰动）、池莉的《烦恼人生》，以及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追溯到萧红的《呼兰河传》，作者认为，《呼兰河传》也有新写实主义的因素。这种历史的溯因法既加强了对当代文学的理解，也加深了对现代文学的认识。作者认为：“‘新写实主义’小说都在淡化阶级关系和政治历史背景，尽量避开重大事件和尖锐的矛盾冲突，而以平常生活原色的叙写为已任，因而不避生活琐事和生命冲动的各种体验的描摹，而这一特点与《呼兰河传》十分相似，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得‘新写实主义’小说同《呼兰河传》一样取得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又认为“‘新写实主义’小说之所以采取直写现实生活的手法，是因为作者对生活有强烈的感悟力，有相信生活的心态。”作者认为，“‘新写实主义’小说从作家主体的角度看，好象看不见作者自己的思想，作者被深深地隐蔽了起来；从反映生活客体的角度看，不进行典型的概括，只是感性地叙写生活的原样；从文体角度看，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可它却是五彩人生的画卷。唯其如此，‘新写实主义’的优势就在于：由于直写生活原貌，给人以亲切感，诱发读者喜欢它；又由于作者把审美判断留给了读者，无形中就赋予作品

以含蓄美和取得了深厚感；由于作者只注意整体象征和作品整个情绪主调，这样不但把作品零零碎碎的生活叙写连缀起来，形成一个意绪的整体，构成一个文化氛围，而且给读者一种既轻柔又浓重的情绪感染，一种朦胧的美感，推动着读者去探寻艺术的堂奥，梳理生活的哲思。”这是好文章，表现了作者对艺术的真知灼见。复述容易失真，不惮征引过多。

我想说，作者的分析大率类此，他一再反对批评中的思维惰性和惯性，反对一切僵化模式，因此，文多新意，而且由于这新意，在或一方面发现了艺术的规律。是的，如托翁所言，“真正评论的任务是发现”，也正由于此，我想，这部论文集必将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陈鸣树

1992年10月9日北京旅次

## 目 录

序.....	陈鸣树(1)
也论鲁迅思想发展道路.....	(1)
谈谈对狂人形象的一些认识 .....	(15)
阿 Q——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 .....	(23)
对民魂的一次深入发掘	
——论祥林嫂的形象 .....	(39)
从《伤逝》的评论看当前鲁迅研究的问题 .....	(50)
简析《论雷峰塔的倒掉》 .....	(59)
试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 .....	(65)
“言情”的艺术意蕴	
——论《金粉世家》兼及张恨水非鸳派作家问题 ...	(76)
《家》的评论三题 .....	(88)
《边城》与沈从文的艺术世界 .....	(99)
现代抒情散文名篇摭谈.....	(115)
现代叙事散文名篇摭谈.....	(144)
《春蚕》艺术谈.....	(170)
谈《果园园》的意境美.....	(180)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真实画卷	
——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185)
从《马伯乐》的成就看萧红的讽刺艺术.....	(201)
从《一地鸡毛》到《呼兰河传》.....	(218)

作家不要随意左右他的 人物	
——评《雪落黄河静无声》中范汉儒的形象塑造……	(229)
论改革题材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兼评有关这方面的评论……	(237)
试论张弦的爱情小说……	(247)
时代呼唤着改革者	
——读中篇小说《雷暴》……	(258)
“真”的文学：在生活与心灵自由的交接处建起	
——从冰心近作说开去……	(266)
影片《子夜》改编得失之我见……	(274)
后记……	(284)

## 也论鲁迅思想发展道路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sup>①</sup>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就是他的战斗风貌和战斗精神的具体概括。他既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的土壤之中，又大无畏地抗拒着来自传统中的一切束缚，他既放手和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和思想的成果，又坚持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所以他能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着，坚韧不拔地战斗着，并经过严肃的、痛苦的自我改造，逐渐地、自觉地成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研究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是很有意义的。鲁迅的一生热情而紧迫地呼唤着人性的觉醒，而这觉醒又是通过爱国主义这一崇高的命题来实现的。他毕生致力国民性的改造，而它又是和挖掘民族的美质，唤起民族的自豪感相反相成的。在他看来，改造国民性是人性复归的有力手段。鲁迅不同意通过超阶级的人性观来实现人性的复归。鲁迅主张现实主义，主张直面血淋淋的严酷的现实生活，主张革故鼎新，由此达到民族复兴和人性自由。因而鲁迅思想发展能够和必然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同步，他的作品能够和必然为革命而呐喊。唯其如

---

<sup>①</sup>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此，我们研究这位伟人的思想发展，是可以发现和总结中国革命的某些经验和教训的，也可以清晰地窥见中国一代进步知识分子是如何经历着一个苦难的历程和他们那向着光明的炽热的心。

然而对鲁迅思想发展的研究目前仍旧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不拟对某些观点作出评述，只是企图从鲁迅思想发展的根据这一角度谈一些看法。

我认为鲁迅思想发展的根据一个是他本身的素质，即他的真诚，一个是中外文化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某些社会生活出其本人预料的变化的刺激，即契机。前者是鲁迅思想发展的内因，后者作为外因，其表现形式往往是突发式的，即一、二件平常生活的遭际，就足以掀动他的思想狂澜。这是因为鲁迅人格的真诚，对人和对来来怀有热望，所以出于预料的事情对他有强大的冲击力。

(最早给鲁迅思想打下烙印的恐怕是少年时代家境的中落了)家庭突然变故，父亲又犯病，他几乎每天都要“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sup>①</sup>世态的炎凉，给入世未深的鲁迅以极大的刺激，他开始发现社会存在冷酷，世人多有虚伪。而这种发现同他从母亲和长妈妈那里所受到的真和善的感染形成反差，这种反差便使得鲁迅从天真向深沉迈出第一步。)

不错，中国民族文化铸造了鲁迅，恩惠了鲁迅。诚然，这种传统文化应该包括来自母亲、长妈妈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宽容和勤劳、善良等民族性格，来自民间的粗鲁的文学和艺

---

<sup>①</sup> 《呐喊·自序》。

术，如一些野史、杂史、民间传说，以及社戏、图画等。它们滋养着幼年鲁迅的心灵，培养了他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心和对反动统治者的仇恨心理，并且也直接影响了鲁迅后来的创作。但是，更多地给鲁迅以恩惠的应该说是儒家的书籍，比如他年幼时读的“四书”“五经”，还有诸如《二十四孝图》等。而这些东西作用于鲁迅身上产生两种情况：一是当他联系到亲身所受的社会刺激时，就加强了他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的反感和仇视；二是又从儒家入世精神中培养了他对社会的参与意识。诚然，鲁迅说过，“中国书里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sup>①</sup>，但是这是从否定中国传统文  
化阻碍改革、崇尚中庸的总体高度说的。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鲁迅从传统中既看到它“僵尸”的一面，也看到了它有用的一面。当然，只能说鲁迅在更多的时候，在总体上是反传统的，这就是鲁迅所以永远战斗不倦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传统文化对他的恩惠。

鲁迅在少年时代有机会和农民孩子的接触，对农民的疾苦也有所了解。后来他回忆这段生活时，感触是颇深的：“我生长于都市的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卉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间或和许多农民相接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的，很多痛苦，和花卉不一样了。”<sup>②</sup>这又是一个惊人的意外！如果说鲁迅没有他的真诚，或者对农民受压迫早已习以为常，成了麻木，就不可能有这种刺激，这种发现，也不可有鲁迅的思想

---

① 《华盖集·青年必读》。

② 《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的进一步开拓。在他以后的创作上，意在表现“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sup>①</sup>都与此有关。

当然，鲁迅更是有意识地从民族文化中挖掘反抗的因素，这就是他曾在会馆里苦苦地抄古碑、古籍的原因。他特别喜欢富于反抗精神的“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嵇康。他辑《古小说钩沉》，校《嵇康集》，就是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又是和他在少年时代与农民孩子接触时所受到的无拘无束情绪的感染互为因果的。瞿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sup>②</sup>中说得好：“鲁迅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这说明鲁迅无论是从文人作品中还是从民间自然形态的文化氛围中都在着力吸取反抗的养料，共同铸造着他的“与黑暗捣乱”的性格。

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多维、多层次、复杂纷繁的大系统，鲁迅是从正与反两个方面吮吸着民族文化的养料，并在多种生活契机的作用下从不同侧面进行这种吸收的。

随着中国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化，文化中的政治因素在不断加强，鲁迅思想也发生急速的变化。人们清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走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更是军阀混战，民族危机四伏。青年的鲁迅，被国事、家事苦苦地困扰着。鲁迅开始思索中国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当时中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正在寻找这个答案。而他们几乎一致地发现：“要救国，只要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发达

① 《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② 载《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sup>①</sup>于是，鲁迅也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sup>②</sup>然而他首先接触的南京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却是“乌烟瘴气”。不过也正是在这时，鲁迅接触了严复翻译的赫胥黎论述达尔文进化论的著作《天演论》，而且成为这部著作虔诚的读者。<sup>③</sup>

这对鲁迅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极大转机。然而这个转机是以鲁迅原有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只是原有的文化层次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罢了。

（鲁迅于 1902 年东渡日本。这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鲁迅到日本后就参加了留日学生的反满爱国运动，跟大伙一起“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还加入过章太炎等人领导的光复会，对章太炎的革命精神和品格十分推崇，这些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有所描述。并且对著名革命家孙中山、邹容等人，也都非常景仰，所受影响颇深。“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诗句，便是鲁迅所受爱国志士影响的集中体现。这是中外文化积极影响的最初效应。

唯其如此，在日本期间的鲁迅特别喜爱和推崇英国的雪莱、拜伦，匈牙利的裴多菲，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为此著有论文《摩罗诗力说》。鲁迅还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学说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并成为他建构改造国民性思想大厦的砖瓦。然而评论界争论较大的是鲁迅的“任个人，排众数”（《文化偏至论》）的评论问题。毋容讳言，鲁迅确实崇拜过尼采，鲁迅思想中也确实

---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② 《呐喊·自序》。

③ 参见《朝花夕拾·琐记》。

有尼采的投影。但我们前面指出过，鲁迅吸收外来文化完全是出于为我所用，并不生吞活剥。试做些比较。鲁迅和尼采都企图把希望寄托在少数优秀人物身上，对“众”有所怀疑。这是他们的相同点。但是鲁迅是由此而要达到“国人之自觉，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即是说，鲁迅在少数与多数之间铺设桥梁，承认他们之间的转化关系。而尼采只讲权力意志，人分两等，彼此间的联系是对立的，难于沟通的。这是一。其次，正因为鲁迅在两者之间架设桥梁，这就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思想，因而，鲁迅的“立人”观点，就其终极目的来说，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群众观有着某种契合的。而尼采的归宿却是不幸的，其学说终于被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这种思想现象是值得人们深思的。然而，遗憾的是，众多的鲁迅研究者只看到尼采影响的一面，看不见他接受尼采影响的，已加进了自己从实践中得来的辩证法思想，以及融进了一颗对祖国赤诚的心这一面。

我们的民族是个不幸的民族。因为在她的身上长久担负着沉重的传统的包袱。统治者一方面骄奢淫逸，一方面满嘴仁义道德；被统治的劳苦大众一方面穷困潦倒，难于为生，一方面还要对统治者感恩戴德，诚惶诚恐。于是，整个社会到处都充满了“瞒和骗”。如蚂蚁似的愚弱的民众就在“瞒和骗”的大泽中讨生活，一天天麻木起来，一代一代麻木下去。而身处异国的鲁迅，对此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这又坚定和加速了他探讨国民性的决心和进程。在日本期间，他经常和他的至友许寿裳谈论国民性的问题。许寿裳于 1944 年写的《忆鲁迅》对此就有过生动的描述：

……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们又常常谈论三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

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实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爱呢？……唯一的救国方法是革命。

从中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之所以在1906年毅然地弃医从文了。而鲁迅在利用文艺改造国民性这伟大战斗途中，首先选用的武器就是进化论。但他是认识到“平和之名，等于无有”，“……祈逆飞而归弦，为理事所无有”<sup>①</sup>的。所以说，进化论确实使鲁迅更加坚定以斗争求生存，求发展的信念。他的描述希腊斯巴达人抵抗外族侵略的《斯巴达之魂》<sup>②</sup>应该说是鲁迅最早的一声呐喊了。文章借异国女性的悲壮气概来唤起我中华的国魂。唯其如此，才有鲁迅的以发展个性为前提的人道主义，能在追求理想人性的战斗中喊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sup>③</sup>的响亮口号。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用鲁迅这两句诗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就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sup>④</sup>此时，各路封建军阀与各色帝国主义相勾结，中国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鲁迅为祖国的前途命运而担忧。鲁迅后来回忆当时的心境时这样写道：“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

---

① 《摩罗诗力说》。

② 收《集外集》。

③ 《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④ 《集外集·哀范爱农三章》。

看来看去，就觉得怀疑起来了，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sup>①</sup>可見当时鲁迅的痛苦是深重的。当鲁迅寂寞地在会馆里抄古碑、古籍时，谁能不说这沉默就包含着愤怒呢。所以，当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时，当北京出现一个倡导文化思想革命的杂志《新青年》时，其欣喜激动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关于鲁迅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在他的《呐喊·自序》中有着具体的说明。）应该说，鲁迅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由于他切实地投身于社会斗争的实践中，而且又能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放到实践中加以检验，所以他思想中唯物辩证法因素不断得到加强。这时，他的思想有乐观的一面，又有悲观的一面。他相信未来，认为希望“是不是能抹杀的”，但同时又无可奈何地不能证明它；他“希望新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sup>②</sup>鲁迅思想表现着深刻的矛盾。然而鲁迅越矛盾、越悲观也就越积蓄着反抗。鲁迅的从《狂人日记》开始的小说创作，他的大量杂文的问世，便是有力的证据。

当“五四”运动高潮过去，新文学运动阵营发生急剧的分化之时，鲁迅确实觉得“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哪里呢？真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然而，鲁迅继续探索，继续前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sup>③</sup>正是他的行动。果然，鲁迅一方面扶植和领导《语丝》、《莽原》和“未名社”，培植文学新军；一方面大无畏地进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事件，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他都

① 《南腔北调·〈自选集〉自序》。

②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③ 《彷徨·题辞》。